

## 壹、緒論

國內、外許多研究都指出教育對於職業與收入都有重要的影響（莊奕琦、陳晏矜，2011；黃毅志，2002；黃毅志、陳怡靖，2005；蔡淑鈴，1988；Featherman & Hauser, 1978; Jencks et al., 1979; Marks, 2009; Platt, 2007）。不過，過去文獻也顯示，有關教育對社會階層位置影響的研究，歐美學者和國內的研究發現並不相同。Blau與Duncan（1967: 5-7）研究指出，職業是個人社會階層位置的最佳單一指標，在高度分工和專業化的社會中，社會聲望、經濟階級和政治權力都根植於職業；雖然本人教育是影響職業的重要因素，但其主要作用是用來解釋職業地位的取得（許嘉猷，1986：220-222；Blau & Duncan, 1967: 9-10; Duncan, Featherman, & Duncan, 1972: 3-5），教育本身所代表的階層區分，並不重要。

然而，相較於國外的研究，國內學者發現在臺灣社會中由於受到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的特殊文化傳統影響，教育除了可以作為提高職業、收入的工具之外，其本身就具有崇高的價值，代表著很重要的社會地位或階層區分（黃毅志，1998a，2002）。受到如此文化傳統的影響，藉著取得更高教育來提升職業、收入與社會地位，已成為臺灣社會民眾提高社經地位的重要途徑。既然教育在臺灣社會階層中的位置是如此重要，教育取得是否符合教育機會均等便成為重要的教育階層化研究議題。

回顧過往臺灣光復初期人民生活艱苦，通常只有富有的家庭才有機會接受較高的教育。隨著經濟發展，國民所得提高，民眾愈來愈有能力負擔子女教育，同時為了爭取更高學歷，對教育需求的聲浪也愈來愈高，促使政府順應民意致力於教育擴充（黃毅志，2011），特別是1994年四一〇教改聯盟提出「廣設高中、大學」的口號，1996年教改會也予以呼應，於是我國的大學數量開始出現擴張趨勢（周祝瑛，2008）。臺灣在教育擴充的過程當中，是否依舊存在著教育機會不均等性的問題？如果有，教育機會不均等性是如何

隨著教育擴充而變遷？這個議題很值得探討。

臺灣過去累積了不少有關教育機會不均等性變遷的研究，這些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類：一是將教育視為連續變項，探討出身背景對教育年數或升學率影響所造成「量」的教育機會不均等性之變遷（李鴻章，1999；陳怡靖、鄭耀男，2000；莊奕琦、陳晏羚，2011；黃毅志，1990，1992，1995；蔡淑鈴、瞿海源，1992；駱明慶，2004）；另一是將教育視為類別變項，探討出身背景對教育分流影響所造成「質」的教育機會不均等性之變遷（章英華、薛承泰、黃毅志，1996；陳怡靖，2001；黃毅志，2011；蔡淑鈴，2004）。先前教育機會不均等性變遷的研究，往往將調查資料分為不同出生年次組做比較分析來推論變遷趨勢，不過這些研究大多因為採用的調查資料年代過於久遠，以致無法反映臺灣近年的社會現況與過去的差別。因此，本研究採用較新調查資料進行不同出生年次組做比較分析，可推論長期的變遷趨勢，研究目的在於探討「量」的教育機會不均等性。

## 貳、文獻探討

### 一、臺灣的教育擴充

臺灣教育的發展與擴充可追溯到臺灣光復初期，自1945年臺灣光復後，政府除了接收日本公立教育系統（包括五年制初等義務教育及少數的高等教育，如臺北帝國大學、臺北經濟學校、臺南工業專門學校、臺中農林專門學校等）之外，於1946年成立臺灣省立師範學校，承擔培養中學師資的任務，到了1967年師範學校升格為師範專科學校（陳寬政、劉正，2004）。

臺灣光復初期仍屬於典型農業社會，從1960年代起，開始由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。因為經濟蓬勃發展，國民所得提高，一般家庭愈來愈有能力負擔教育支出，加上受到「重視教育」的傳統文化影響，使得國民升學意願大大提升，政府也增加教育經費用於擴充各級學校，造成急速教育擴充（黃毅